

北周武帝滅佛莫高窟倖免原因蠡測

潘春輝

北周武帝滅佛（574~578）為「三武滅佛」之一，規模與影響巨大。「（武帝）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官私所造一切佛塔。融刮聖像，焚燒經典。」¹「關隴佛法，誅除略盡」²聲勢十分浩大，並蔓延至敦煌城內。當時敦煌城內阿育王寺和大乘寺就遭毀佛：「瓜洲城東古基者，乃周朝阿育王寺也。廢教以後，隋雖興法更不置寺。今為寺莊塔有舍覆，東西廊廡迴牆匝。」³「沙洲城內廢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見有塔基。」⁴但難以理解的是此次滅佛對莫高窟似乎影響不大，此時期洞窟保存完好，並無遭到破壞之痕迹。北周第 220 窟甬道南壁翟奉達手書家譜亦可為證：「大成元年（579）己亥歲□□遷與三危□□鑄龕□□□聖容立像……」莫高窟的開窟造像活動一直在進行。對於莫高窟未遭此次難佛之因，史書語焉不詳。筆者擬對此作一蠡測，請方家指正。

壹

莫高窟地理位置的孤懸偏遠，應是其躲過此次佛難之主因。

北周滅佛前，其境內寺院經濟獲極大發展，寺院「侵奪細民，廣占田宅」⁵，嚴重影響政府財政收入，「凡厥良沃，悉為僧有，傾竭府庫，充佛福田」⁶。對志在滅北齊，「必使天下一統」⁷的武帝而言，滅佛遂成為取得財力與兵力的重要手段。故武帝「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⁸，滅佛以求「富國強兵」。然，莫高窟不僅遠離中原腹地，而且距敦煌城亦遠，且為沙磧包圍，十分閉塞。它位於敦煌城南 25 公里處，其間絕大部分是戈壁、沙漠與

¹ 《歷代三寶記》卷 11。

² 《神州三寶感通錄》《大正藏》卷 52。

³ 《魏書》卷 114《釋老志》。

⁴ 《廣弘明集》卷 7《齊章仇子佗疏》。

⁵ 《周書》卷 6《武帝紀·下》。

⁶ 曇積《諫周祖沙汰僧表》。

山地，北有馬鬃山等天山餘脈屏障，西接塔里木盆地流沙區，東南有祁連山層層阻隔，幾十里內杳無人煙。莫高窟隱匿在無盡戈壁與沙海中。S.5448「(沙洲)南有莫高窟，去洲二十五里，中過石磧，帶山坡至彼門下穀中，其東即三危山，西即鳴沙山」⁷。它雖是佛苑明珠，但卻為大漠風塵所阻隔。對此，北周滅佛就有了「天高皇帝遠」「鞭長莫及」之遺憾。且滅佛中，滅北齊業已開始，對財富與兵力的需求日益緊迫，滅掉都城附近或位置便利地區的寺院，對政府財力的增加會更快捷、更省力。而滅掉偏遠的莫高窟就顯得滯後與費力。政令到達此地尚需時日，且當時交通並不發達。在此種情況下，滅掉莫高窟是得不償失的。

同時，還可從武帝滅佛政府措施所具有的影響力來看莫高窟孤懸的地理位置對於它倖免於難的重要意義。

北周時期，中央政府實力不強，財力有限，「比以寇難猶梗，九州未一，軍戎費廣，百姓空虛」⁸，其對地方影響力將打折扣。故，我們對武帝滅佛的影響力就不能估計過高。如，靠近長安的天水麥積山石窟，保存至今的北周造像不少，著名的大都督李允信（或為李充信）在武帝保定、天和年間為其亡父造的七佛龕，就保存完好。武帝平北齊「凡是經像皆毀之」⁹，但洛陽龍門石窟卻完好地保存著「藥方洞」、「路洞」那樣有確鑿題年的洞窟。至於北周、北齊之前的洞窟，更是安然無恙。如此著名的佛窟都未被毀而完好保存下來，可見，北周武帝滅佛的力度並非如史書記載的那樣強烈。

再者，武帝滅佛政策推行時間不長，只是其臨死前四年中之事，且滅佛中又穿插著滅北齊的軍事活動。故，武帝對滅佛所真正投入的精力與財力是有限的。正如北魏滅佛：「佛教論廢積七、八年，然四方佛事仍不能禁，唯不得顯行於京都矣。」「禁稍寬弛，篤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門專至者，猶竅法服誦習焉。」¹⁰一樣，北周武帝滅佛所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地區恐為都城或附近地區，而偏遠的莫高窟則是武帝滅佛之影響力所不能及的。

故，莫高窟之倖免與其地理位置的偏遠息息相關。

⁷ 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86。

⁸ 《周書》卷5《武帝紀·上》。

⁹ 《廣弘明集》卷6。

¹⁰ 《魏書》卷114《釋老志》。

貳

自佛教傳入敦煌起，已逐漸溶入到敦煌民衆生活之中，形成了其根深蒂固的影響。莫高窟乃敦煌民衆信佛之重要體現，它在崇佛的敦煌人民心中地位極高。這種影響與地位是莫高窟躲過此次佛難的又一深層原因。

早在三世紀末，敦煌就已有寺院與譯經之翻譯家。十六國後期，戰亂頻仍，人民倍受戰爭煎熬，爲祈求來生幸福，紛紛求助於佛教，佛教成爲敦煌人民的精神寄託，營造佛窟興盛起來。上自統治集團，下至貧民百姓，包括敦煌各階層、各職業的人都建起了自己的佛窟，即所謂「君臣締構而興隆，道俗鏤妝而信仰。」¹¹莫高窟建立在人民廣泛信佛的基礎之上，有著雄厚的群衆信仰基礎。無論是巨窟、大畫，還是小龕、小幅，亦或是一、二身佛、菩薩，都凝聚著建窟人的心血，表達了他們各自的現世利益：爲帝王萬歲，爲國泰民安，爲健在親族，爲先代之靈¹²。敦煌人民將其願望、信仰都寄託於他們各自的佛窟、佛像乃至每一幅畫像上，推倒一尊佛像就可能摧毀一個家庭的精神支柱，摧毀了莫高窟就相當於粉碎了大多數敦煌人民之信仰。莫高窟不僅僅是一座佛窟，它是千千萬萬敦煌人民信仰之所在。此時的滅佛活動就不能僅僅考慮到是否可以獲得更多的財富與勞力了，還應考慮到此處人民的特殊情緒與莫高窟在敦煌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這都將會促使武帝在莫高窟的毀佛行動上採取慎重態度。

此外，佛教勢力在敦煌地區影響深遠，而爲敦煌佛教之集大成者的莫高窟，則是佛教勢力在敦煌地區深入滲透、廣泛傳播的最佳例證。如，莫高窟長年舉辦的齋會，幾乎是全體敦煌人民的共同節日，莫高窟第 469 窟內的一條題記可爲證：「府主、太保就窟上造兩千仁窟。」規模之大，參與人數之多可見一斑；一般百姓還可在莫高窟內接受佛教教育，他們從五彩繽紛的壁畫上，瞭解佛教的內容與教義；再加上在一些規模較大、內容較豐富的洞窟中常有經師或學問僧作些宣講，使莫高窟佛教更加深入人心，成爲敦煌古代社會民衆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¹³從中可看到莫高窟是促成當地濃厚佛教信仰氛圍與厚重佛教文化積澱的重要原因。它深深紮根於當地廣袤的佛教土壤之中，成爲當地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地位崇高、影響極大。在

¹¹ S.3929《畫行都料董保德功德頌》。

¹² P.2641.v, P.2990.v, P.3457, P.3540。

¹³ P.2641.v, P.2990.v, P.3457, P.3540。

這樣一個地區滅佛其難度就不單是穿沙漠越高山了，還應包含有當地人民的敵視與仇恨。它將有觸動衆怒、失掉民心的可能，對武帝自身的統治是不利的。對此，武帝不會不斟酌考慮。這又促成了莫高窟之倖免於難。

莫高窟不僅在當地民衆心目中地位神聖，在東來西往的僧侶和商販等人的心中也有著重要地位。敦煌位於絲路樞紐，西去求法與東來傳教僧衆均途經於此，如：399 年東晉僧人法顯等經敦煌西行取經；518 年北魏派敦煌人宋雲等西行取經等。敦煌既是東來僧人步入河西走廊的最初落腳點，也是西去僧侶和使臣告別故國之地。除求法僧外，大量的商人也要經過敦煌，商人行旅由此西去，越過陽關、玉門關就是無盡的戈壁與大漠，等待他們的是風暴、饑渴、搶劫等難以盡數的困難。莫高窟 420 窟窟頂東坡壁畫《觀世音普門品》就形象地反映了這一現實，真實再現了絲路的艱難，以及商旅們爲保平安而對佛的祈求¹⁴。在離別敦煌之前向佛寺佈施，祈求佛的保佑，不僅在心理上是個安慰，也會增加他們克服困難的勇氣。所以，對於東來西往之人，出行與離別前的拜佛活動必不可。而去莫高窟這樣著名的大型佛窟，對於那些祈求旅程平安的人而言，是一次顯示他們虔誠之心的上選，對他們心理上的安慰會更大，出行之前的思想負擔亦會減輕，這使得莫高窟前祈求之人不斷，施主不絕。

故，來往于敦煌的商人、使者、僧侶等是莫高窟佛教發展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在不自覺中爲莫高窟香火添油加柴。

當地人民與來往過客的崇佛與祈求，都促進了莫高窟佛事的興盛，而莫高窟佛事愈興盛，它抵制外界侵害的能力亦愈強。這是莫高窟倖免於難的又一原因所在。

參

敦煌地方長官與世家大族的興佛是莫高窟倖免於武帝佛難的另一重要原因。

北周時期，任瓜州刺史在建平公于義，乃一度誠佛教徒。武周聖曆元年（698）《李君（克讓）莫高窟佛龕碑》有云：「複有刺使建平公、東陽王等各修一大窟」「樂傳、法良發其宗，建平、東陽弘其迹。」建平公即于義。

¹⁴ 史葦湘〈絲纏之路上的敦煌與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2 年，頁 52～53。

于義任瓜州刺使之時約為 565 至 567 年，正值武帝滅佛。¹⁵他在任期間進行了大規模的開窟造像活動，據敦煌研究院排年分期，北周洞窟最大者為 428 窟，即于義所建。窟內除 1200 多身供養人像外，還有大量僧尼形象。從中可推測出建平公是 428 窟的發起者、大施主，其餘之人則踴躍回應。于義為莫高窟佛教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興佛活動致使「合州黎庶，造作相仍」。莫高窟掀起開窟高潮，逐漸發展成為佛教徒傳授教義、舉行佛事之重要場所。于義興佛與武帝滅佛形成反差。這位佞佛的地方實權人物對武帝滅佛的干預和抵制可想而知，這同樣也促成了莫高窟之倖免於難。

除地方長官外，敦煌當地崇佛之世家大族對武帝滅佛亦起到了不小的抵制作用。敦煌世家大族大都崇佛。如前所述于義，從其父始就為朝廷重臣，于義也歷次受封平昌縣伯、安武太守等，其家族中大將軍以上者十餘人。據《周書·于寔傳》載，于義之兄于寔，天和六年（571）後任涼州總管，而于義此時任瓜州刺使，于家當時不僅是瓜州的大族，而且是河西地區的權貴。由於于家在中央政府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地方的影響，使得于義佞佛有著強大的政治背景與後盾。號稱「敦煌五龍」之一的鉅鹿郡索氏也極為崇佛，如從北魏 284 窟「信女索金一心供養」的石窟供養像題名上，可知索氏至少從北魏開始就在修造佛窟。陰氏早在西魏 285 窟供養題名中已有陰安歸、陰苟生、陰無忌等¹⁶。以上可見，敦煌世家大族佞佛程度之深，他們不惜花費大量人力物力來修建佛窟，以示敬佛之心。敦煌大族不僅是當地權力與財富的支配者，在中央政府中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隴右金石錄》載《敦煌索公紀德碑》謂：「索勳祖靖仕魏晉，位登一品，才術三端，出入兩朝，功名俱遂。」他們的一舉一動對中央決策將形成影響，中央舉措亦不得不考慮他們的利益。武帝滅佛與敦煌大族崇佛背道而馳，這必將遭到他們的反對。且大族的每一佛窟依其姓氏被稱為「家窟」，並由子孫世代世襲相承。¹⁷在忠孝觀念極為濃厚的敦煌人心目中，先代窟寺乃祖先舊業的一部分，所謂「祖孫五枝，圖素四剎，堂構免墜，詒厥無哲」¹⁸，「命駕傾誠，謁先人之寶剎；回顧粉壁，念疇昔之遺蹤」¹⁹。莫高窟具有強烈的「慎終追遠」、「先人遺澤」

¹⁵ 施萍亭〈建平公與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47。

¹⁶ 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文物出版社 1986 年，頁 182~185。

¹⁷ 史葦湘〈世族與石窟〉，《敦煌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 年。

¹⁸ 《唐隴西李府郡修功德記》。

¹⁹ 《唐隴西李府郡修功德記》。

的含義，故各大家族對自己之家窟不斷「募良工」「訪杞梓」進行重修，使莫高窟有千年的營建史²⁰，對於這樣一批既佞佛又極具儒家忠孝思想之世家大族而言，毀掉莫高窟就相當於毀了祖先之基業，就犯下了「欺師滅祖」之罪，意味著對祖先的不忠不孝，這是敦煌大族所無法接受的。故敦煌大族對武帝滅佛的反對應是非常強烈的，加上他們自身的地位與影響，使這種反對具有很大的能量與攻擊力。武帝不會不考慮他們態度，這同樣也促成了莫高窟的倖免。

肆

北周武帝滅佛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崇儒漢化。武帝滅佛前，曾大力推行漢化政策，提倡儒家學說。然，「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²¹武帝恥同五胡，故責佛教為非「正教」。他認為佛教不符合儒家思想，為漢化政策之障礙。然莫高窟佛教在武帝滅佛之前就已與儒家思想溶為一體，處處體現出儒家思想。如從壁畫形式上看，第 257 窟「九色鹿本生」中，採用了漢晉儒家思想故事畫經常採用的橫卷連續畫形式，每一情節都標以標題，構成完整的漢式畫像節。同時，在塑像和故事中大量採用中原漢裝與南朝「瘦骨清像」、大冠高履、褒衣博帶的人物形象。這些變化都反映出漢家美學思想。壁畫亦如此，如第 290 窟的佛傳圖，圖中人物衣冠多為漢晉遺制，印度淨飯王變成中國皇帝，摩耶夫人身著漢晉后妃服裝，太子還宮時所乘的交龍車即顧愷之《洛神賦》圖中的雲車。線描造型，人物暈染也都用中原漢家手法²²。就連洞窟窟頂的裝飾圖案也進一步漢化，原來模仿我國古代建築頂部的裝飾藻井變成了華蓋。如 285 窟窟頂之華蓋。在題材上也出現了符合漢家倫理的宣傳忠孝慈愛的故事畫。290 窟「善事太子入海求珠」即為一例。上述變化無疑是莫高窟佛教儒家化之反映，它已經基本脫離了佛教初傳時的表現手法，呈現出強烈的漢化色彩。它符合了武帝崇儒漢化思想，已不再是「胡教」了，正如史葦湘先生所言：「佛教從經義到藝術形象，一進入玉門關就

²⁰ 史葦湘〈論敦煌佛教藝術的世俗性〉，《敦煌研究》，1985 年 3 期。

²¹ 《晉書》卷 95《佛圖澄傳》。

²² 寧可、郝春文《敦煌的歷史和文化》，新華出版社，1993 年。

要成為漢民族的佛教和佛教藝術」²³。故莫高窟不是武帝漢化政策的障礙，而是其漢化政策之成果。對此武帝應引以為範而不會滅掉它。正是由於武帝崇儒才導致其滅佛，然而恰恰又是這個原因，又為已經儒化之莫高窟披上了保護外衣。對於這樣一座漢化的佛窟，毀掉它只會為儒化政策增加阻力。故莫高窟倖免與其自身儒化緊密相連。

綜上所述，莫高窟躲過北周武帝滅佛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對莫高窟來講，對中國佛教來講都是一大幸事。

（作者工作單位：西北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研究生）



²³ 史葦湘〈敦煌佛教藝術的基礎〉，《中國佛學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